

1206.7
C49

主编 饶芃子



比较文艺学丛书

Chinese Women's Criticism

陈志红 著

反抗与困境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

责任编辑 周书田

封面设计 王 霖

责任监制 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著.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3

(比较文化学丛书/饶芃子主编)

ISBN 7-81083-068-6

I.反… II.陈… III.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06192号

反抗与困境	陈志红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310002	
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2002年3月第1版	2002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75
字数:112千	印数:0001—2000
ISBN 7-81083-068-6/I·3	定价:14.00元

在被质问去表明我们的存在之前，要让我们
进入存在的状态。

——杰弗逊

希望有一天，不分性别，人类可以有他个人的
尊严，享受辛苦得来的自由。

——西蒙·波伏娃

内容提要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 20 世纪文学批评中重要而充满活力的流派之一。它对整个西方思想文化产生的震撼和冲击一直延续至今。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开始了这一批评模式在中国的理論旅行。该著详尽地考察了这一批评模式进入中国之后,是如何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过程。一种外来文论的本土化是经由什么方式实现的?其间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它是怎样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元的?这些问题在该著中都得到了客观而严谨的分析。可以说,这是对近 20 年来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梳理,是一部有较强理论色彩的中国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史论。

《比较文艺学丛书》总序

饶芃子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20多年来，这个领域已有了迅速的发展，不仅有了许许多多的成果，还有了自己的刊物、队伍、组织，并且进入了高等学府，形成独立的学科，有一定数量的硕士、博士等高学位点，高层的学术活动也已同国际比较文学界接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日益成为了一门显学。”（见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回顾这个过程，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及其发展，是与学界人们世界性视野和开放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比较文学的特点在于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就是要突破文学研究的国家、民族、地域、文化和学科的界线，以新观念、新眼光开展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比较文学的开放交流精神是它作为一门学科与生俱来的，贯穿始终的本质所在。早在19世纪末，比较文学在西方兴起的一个基本认知，就是认为世界各国、民族、地区的文学，都不是彼此隔绝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现在，历史发展到21世纪，这个时代是一个科技、资信发达的时代，文化、文学交流频繁，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发展，都离不开国际环境和异国、异族的影响，还有不同学科的交叉介入，因而研究者在面对本国或外国的文学问题时，都必须有世界性的广阔视野与眼光，将其放在世界文学格局和国与国文化、文学关系中进行考察，才能探得其究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比较文学在学坛的勃兴，正是与这种世界性的文化发展潮流相适应。

近20年,随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比较诗学兴起,中国诗学的价值日益为人所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也成为比较诗学的一个新的拓展方向。美籍华人刘若愚在中西比较诗学的倡导、研究上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他在《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不仅把自己的倡导变成实践,还从理论上阐明中西比较诗学的目的和价值,他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目的,是“对一个最后可能的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在他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总序中,也特别说明中西比较文学必须导向中西比较诗学的道理,他认为,在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中,要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就不能停留在一般表层的比较,而应深入到“每一个批评导向里的理论,找出它们各个在东方西方两个文化美学传统里生成演化的‘同’与‘异’,在它们互照互对互比互识的过程中,找出一些发自共同美学据点的问题,然后才用其相同或近似的表现程序来印证跨文化美学汇通的可能。”(叶维廉:《比较诗学》第16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建构批评理论。在我国,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都是新时期中西比较诗学路碑式的成果。中西比较诗学与一般的中国或西方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同,它要求研究者有更广阔的视野、国际的眼光和自觉的比较意识,要超越本民族文化体系的美学模式,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或者说,去促进“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所以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拓展,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由于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对寻找人类文学的共同规律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这一领域的成果同文艺学学科有直接、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上有若干交叉、重叠的地方,于是,在这两者的交叉领域寻找比较文学与文艺学的结合点,用以推动文艺学学科内涵的更新和发展,就不仅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而这,正

是90年代我们在建设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时,把比较文艺学作为一个新方向建立的学理基点。

全球化的21世纪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新世纪。在这一背景下,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必须是开放的、多元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文艺学在中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有许多世界性的因素,无论是从总结以往学科史的经验,还是对学科前景的思考探索,都必须重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当今,人类共享的知识基础的范围日趋扩大,随之而来产生了文化的日趋融合,世界各国的理论家均具有多国学术的亲缘关系,经常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对话,互识、互补,通过不同文化与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学研究,创造更加宏阔的学术空间,有助于突现自己的学科个性、学科的前卫精神。学科建设有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从学科的内部而言,要有本学科新的理论建树;从学科的外部而言,要能对整个学术界和时代前进产生积极的作用。从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现状看,成果很多,其中有许多是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如现代主义、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也有从其中的某些理论出发来阐明我国文学问题的;还有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演讲过程作综合研究的;对中西文论总体特色和范畴比较的研究成果也不少。相对而言,对重要理论问题的深入探究太少,结合历史和现状,对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论发展中具有学术价值问题的研究极待展开,而这两方面又与资料建设工作密切相关,因为专题研究都必须建立在资料的基础上,所谓资料建设,应包括目录、索引、资料汇编、选编等,以前这方面成果很少。这与过去学术界对资料工作的轻视有关,过去,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资料收集、整理、编选,不是科研成果。近几年,学界对人文学科中资料建设工作落后现象,已给予关注,其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已越来越突出。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比较文学和文艺学的学

科发展，同样不能忽略这方面的工作。

正是出于上述的思考，我主编了这套《比较文艺学丛书》。

本丛书共六册，三册是研究资料汇编，三册是专题研究论著。研究资料汇编分别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饶芃子、王琢编）、《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郁龙余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钱超英编）。所辑录的文章和有关研究资料，都是从大量原始资料中筛选出来的，其中不少是中外知名学者所撰写的论文，我们的编选原则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旨在向学界和广大读者介绍较少人注意的几个学术领域。从这些研究资料中，可以看到中日、中印比较文学研究的历史沿革，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的概况。《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把80年代以来的研究论文按编年史编出，并附有文献目录要览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相关资料，还附录选编者撰写的两篇介绍中日和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概况的文章。《中国、印度比较论文选》（1987—2001），是国内首本这一时期的中印文学比较论文选。由于8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比较诗学等，均有不少新的成果问世，编者没有按编年史编排，而是以内容类别分成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两大部分，还附录了编者在这之前编选的《中印文学关系源流》一书目录，该书于1987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华书局联合出版，搜集的资料是从近代至1982年，同现在这本“论文选”有上下衔接的关系。《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是我国大陆第一本关于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其相关文化问题的批评、研究资料集。该书多数文章直接得自海外，而在此前未为国内读者所见，在编排体例上，是以文章内容分类编辑，全书分综观篇、专题编、交流编三大部分，从不同方面展示澳华新移民复杂的文化生态和景观。

三本专题研究论著，分别是《赋、比、兴的现代阐释》（陈丽虹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陈志红著）、

《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卫景宜著)。《赋、比、兴的现代阐释》着重追问、探索传统的赋、比、兴诗学范畴在现代是如何被阐释的。关于赋、比、兴,汉代经师及其后的历代论者,作出过极为纷繁的解说;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大陆和海外学者也提出过诸多新说。本书作者则着重追溯从“五四”至1949年的30年中,学界对赋、比、兴的新解,这一阶段,正是传统模式向现代新模式转型的时期,从黄宗羲、梁启超到胡适、郭沫若,倡导和实行诗界革命,诗学思想相应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考察这一背景下赋、比、兴的动态涵义,既注意传统的延伸,又把重点放在论述其“现代”的变异,以个案的形式参与当前“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讨论。特别有创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不仅注意学者对赋、比、兴涵义的理论探索,还注意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体现、流露的诗学观念,因而在立论上显得通达而带有生气。《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研究的是近20年女性主义批评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及其进入中国大陆之后的理论形态,如何获得有效生存等问题。作者深入到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內部,对有关资料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概括出“建构式”、“兼容式”、“颠覆式”三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类型。由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批评现象,但对这一现象的整体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的真正重视,因而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开拓性。对于比较文艺学而言,这本书的学术意义在于: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入传中国为个案,来探讨“传播与影响”的理论问题,作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十分熟悉,占有详尽的材料,对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整体也有较深刻的认识,因而能从一个理论较高点上描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这一授受过程,及其被中国化的命运。在书中,作者不但论述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生长”,也探讨了它存在的困境和可

能的发展空间,颇有史论意味。《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以美国华裔作家汤婷婷的系列小说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将美国华裔英语文学中的中国书写,放在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史、美国华人史以及美国文化三重背景下,进行互动性研究和跨文化审视,指出此类作品与西方主流霸权话语的内在对抗;这种文学写作的边缘文化属性。分析这些作品中挪用、改写中国文学经典故事、建构新的华裔文化形象的独特价值,阐明这些生活在西方具有双重文化身份的作家,如何在文学创作中表达华裔族性和情感,提出民族文化持存是一个不断改变、建构的开放过程。作者在论述中,借鉴了西方的文化理论、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写作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在一手资料的占有和对资料的理论提升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是目前国内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较为可靠和整体性成果。近20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大陆学界兴起,已有不少著作问世,但研究海外华裔英语文学则甚的罕见,前不久出版的钱超英博士的《“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本人主编的万叶文丛·学术书系之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是第一本研究1988至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将一个国家的华文文学和华裔英语文学整合研究的著作,该著作的关注点是海外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问题。本书作者研究的对象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关注点是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书写,这就从一个方面拓展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本丛书所以命名为《比较文艺学丛书》,是因为这六本书作者所做的,都属于比较文艺学的基础性工作,虽然比之应该去做的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它们只是一些小小的“点”,但“面”的工作总是从“点”开始的,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就具有某种意义上开拓性。

2001年6月16日于暨南园

目 录

倒叙：作为引言·····	(1)
第一章 众声喧哗中的悄然出场	
一 中断与衔接·····	(5)
二 接受与选择·····	(15)
三 合法性及其质疑·····	(24)
第二章 反抗性阅读	
一 立场的政治性·····	(38)
二 建构式：寻找传统·····	(46)
三 兼容式：“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	(57)
四 颠覆式：重读与拆解·····	(66)
第三章 20 年，走到了哪里？	
一 女性写作：看与被看·····	(83)
二 犹在镜中：突围与陷落·····	(98)
三 性别诗学：可能与困境·····	(110)
回到出发地：作为结语·····	(112)
注释·····	(121)
主要参考文献·····	(129)
后记·····	(132)

倒叙：作为引言

当 20 世纪的夕阳渐渐沉入地平线，一个新的世纪正快步向我们走来时，我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人文杂志之一《读书》上读到了李小江《世纪末看“第二性”》¹一文。作为中国当代女性学的垦荒者和创始人，她的反省性的世纪回眸颇有深意。

话题是从西蒙娜·德·波伏娃那本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现代女权主义经典之作《第二性》开始的。这部著作给中国的妇女研究（自然也包括女性文学的研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这部西蒙娜·波伏娃写于 1949 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翻译出版的著作，几乎就是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²。尽管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女权主义理论被陆续翻译过来，但数量很少，与 80 年代初以来大量西方文艺理论批评著作的涌进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它所透露的在传播与接受意义上的盲视与歧视，将成为笔者进入问题的入口之一。

《第二性》中文版问世至今已经 15 年。而“女权主义”这株异域奇葩在中国也已渐渐演变成为“女性主义”，至于其间所需要的历史文化过程，则被悄然地模糊和省略掉了。这种模糊和省略，打上了鲜明的中国式烙印。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被引进的理论思潮，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其理论资源、精神品格、目标诉求上的革命性和反抗性品格，已被有效植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话语体系之中，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模式和潮流，它已然成形，并渐成气候。一批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不屈不挠的努力，使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版图上，有了一片令人不可小

视的板块。

正是因为已有了一批可观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绩，李小江的世纪回眸才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在充分肯定波伏娃的价值的同时，更多的是“冷静的审视和批评”，是对“神话”批判的再批判：当年波伏娃那句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这句曾经作为新女权运动向男权社会宣战的流行语影响了几代女权主义者的名言，终于在中国学者这里受到了批评性质疑：

“波伏娃当年详尽分析了‘（男）人造女人’的历史，力图破除将女人‘第二等级’的社会身份本质化的神话，鼓励妇女向所谓‘天生的’性别挑战，与世代沿袭的依附性告别，做独立自主的人。我们今天再破波伏娃的‘人造女人’神话，则是要在本体论的起点上重建妇女的主体地位，从思想上与男性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决裂。就是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认同女性的主体身份；与自然共处，而不是否认自然差异或向自然宣战——这才是女人可能在精神和情感上真正站立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基础。”³

如果说波伏娃当年是在向性别本质主义宣战、只是说出了一半的真理的话，那么，李小江则是在向文化本质主义宣战，力图说出全部的真理：“女人的确是天生的，而女人身为‘第二性’的屈辱地位则是后天生成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这显然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中国式改造。这种改造的背后，是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中国操持着女权主义理论游刃于文学批评领域的学者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展开自己的问题。影响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过程，与其他许多西方理论的进入情形并不完全相同，从一开始就不是囫囵吞枣式的简单接受，它在相当程度上遭受的质疑和冷遇使有兴趣于它的学者们对它保持着应有的距离和冷静。这样的距离和冷静带

来了一个充满弹性的思维空间：借用他人的犁耙来耕耘自己的土地，并在耕耘中对犁耙进行不断地修正、改造和完善。

李小江对波伏娃的批评性质疑，虽然只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持审慎态度的一个个案，但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一种审慎中开始了自己的理论旅程。在理论形态和精神品格上，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域性，但它对问题的展开和进入，则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借鉴西方而又立足本土，尽可能地以自己的声音，参与一种世界性的对话。这种情形，与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在西方文化的直接影响下摇晃着前进的状况是一样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不断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轨迹也是一个具有意义的个案。在西方文化事实上已成为强势文化的背景下，承认局限而又不为局限所囿，反抗文化宿命，这正是中国学界正在探讨的大问题。本文也拟将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探讨，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

很显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是两个相近而又不完全相同的命题。前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理论形态的总括，是一种基本稳定和成熟后的命名，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动感，它可以“在”中国，也可以“不在”中国，它“在”中国之前的情形如何？它是如何取得“在中国”的合法性的？它“在中国”之后的情形又如何？而这些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还可以使问题不断地延伸和扩展。

作为对一种横向移植的批评模式的研究，我的重点放在它进入本土之后的理论形态、特点上，这是一条中轴线。而我们知道，这个过程虽然迄今为止还不到20年，但其间所蕴含的历史延续，却是无限的。就一个批评模式的行进轨迹来说，它依然在发展之中，而这并不妨碍它同时成为一个切片，进入研究的视野。

围绕着中轴线，我希望能使一些问题凸显出来。我希望能通

过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一批评模式的理论资源、话语方式、精神品格的探究，了解它是如何有效地介入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话语转型、如何有效地进入对文学主流（非主流）话语的反抗性解读、如何有效地参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运作的。

我希望能够比较充分地展示这一批评模式的政治性与非中性性，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和中心原则。而在研究过程中，我同时注意到，它的革命性和反抗性几乎无处不在。它的锋芒所指，首先是整个男权文化，进而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权力网络，试图对此进行彻底的颠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革命性和反抗性这一点上是血脉相连的，而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则既有相同又有不同。这样，中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异同也将会作为背景和参照穿插于研究之中。

第一章 众声喧哗中的悄然出场

一 中断与衔接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是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年代。在结束了相当长的极左政治路线及其意识形态统治之后，历史中的许多中断在这个年代得以重新衔接和延续。

在目前我们见到的许多中国文学史中，对于文学年代的分期，大多采用了客观线性时间的划分方式，而这种方式往往又是以政权的更迭、朝代的变换直接相关的。这间接地说明了文学与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关系。一个朝代（政权）的消亡或确立，能够对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格局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显然已被已往的中国文学史一再地证明过了。

关于这一点，中西方（西方在这里只不过是欧美的代名词而已）的情形不大相同，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与欧美在 20 世纪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同，中国从 1911 年推翻帝制，才不无被动地开始了力图现代化的进程。这种不平衡的历史进程先在地决定了中/西二分结构、以西方为中心、为楷模的思维方式的形成。

这是中国人不得不面对的第一次中断：在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中，以与中国古代传统决裂的方式面向西方。“五四”运动则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今天学界中不少学者已开始探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态度（例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但向西方学习无可置疑地成为当时重要的社会思潮。

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本世纪初,从大的方面来讲,在中国人这里,实际上有着‘两个’西方,一个是追求现代性的西方,一个是反抗现代性的西方。……当时中国的现代性正在起步、孕育阶段,根本不会看到、甚至不会梦想到会有反抗现代性的‘主义’存在。在当时中国人的眼中,西方是一个统一的、先进的西方。”^[1]这就是中国20世纪之初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在以西方为楷模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基本上奉行的是一古脑的“拿来主义”,而且“拿来”的基本上又是西方18、19世纪的社会、文化理论资源,这个源头可以大致归纳为一种理性的、启蒙的传统。而西方社会文化内部一直存在着的对现存秩序的质疑、批判的传统、从19世纪中叶以来开始孕育、到20世纪初已渐成形的以对现代性的思考和批判为主要理论特征的现代主义思潮,虽然也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产生过一些回响,但这在当时积弱已久,图强救国呼声强烈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回响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20世纪初,中国人在与自己的古典传统决裂、试图通过现代化的进程与西方的历史与文化相衔接的同时,望到的其实只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一个背影。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表现出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强烈的社会政治功利性。在民族危亡和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中,意识形态的一统化格局逐步形成,到20世纪60、70年代,这种意识形态一统化的控制,终于发展到了它的极端。

如果说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中断是以中国古典传统的断裂为特征的话,那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则遭遇了第二次中断,这就是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的全面隔绝。

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意识形态“清场”。

“五四”时期,可以视为中国第一次“西学东渐”的高潮。西方各种主要理论思潮都或多或少引进来了。仅以西方哲学的传播为例,“五四”时期,从古代希腊哲学到当时西方流行的一些重要流派,如从新实在论到唯意志主义、国家主义、生命哲学、英美